

延伸阅读：依靠农会，在珠三角完成征借军粮的任务

□梁平

番禺刚解放，一个紧迫而突出的任务，就是征借军粮支援前线。禺南南区是全县重点产粮区，土地非常集中，全区稻田 98% 为地主所有。当时正值秋收时节，为了不失时机地完成征借军粮任务，经上级同意，原地下党关系暂时不变，把禺南南区支前指挥所改为番（禺）东（莞）中（山）顺（德）边区支前指挥所，我任指挥所主任，所址设在大岗。指挥所下设秘书股（负责人郑德）、粮秣股（负责人区藜）、运输股（负责人卢如）。经独立团领导同意，从独立第一连抽出手枪班到指挥所担负保卫工作。参加指挥所征粮队的，除原来地下工作同志外，还有石平同志带队的四野十五兵团民运队，许树同志带队的两广纵队民运队，梁田、周天祥同志带队的珠江军分区文工团，胡明同志带队的番禺独立团文工队等 100 多人。各乡普遍成立了支前小组，迅速展开支前工作。

一是征借办法。我们考虑到沙田区苛捐杂税征特别重，而地主通常又把苛捐杂税算入地租，将原租额再提高 100 斤左右，压得农民透不过气来，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解放了，应取消这些压在农民头上的包括苛捐杂税在内的高额地租，按早四晚六计算，每亩应退还耕本谷 60 斤（批耕包租田）或 55 斤（包租田）给佃农。地主退还耕本给佃农后按全年计算其收入征借，佃富农以下各阶层则按半年计算其收入征借。佃富农无免征额，中农免征额为每人 75 斤，贫农每人 150 斤。

据当时的调查统计资料，各阶层的实际负担率是：贫农 5—7 斤，平均每亩 2—6 斤；中农 9—14 斤，平均每亩 9—15 斤；富农 20—25 斤，平均每亩 20—40 斤；地主特别是大地主 75 斤以上，几乎把晚造的全部收入交出来。

二是征借步骤。分两期进行，先征地主的，后征农民的。同时明确规定，秋收后佃农应交的全部租谷由当地农会冻结，扣除耕本后，由佃农直接按亩代地主缴交支前军粮，余下部分和征粮收据一起交给地主。

为了确保退还耕本归佃农和迅速完成征借军粮任务，11 月初，我们在灵山召开一个全边区农民代表和地主代表关于归还耕本问题的辩论会。到会有农民代表 100 多人和地主代表（主要是沙湾、古坝的）10 多人。第一次开这样的会，番禺县委书记兼县支前指挥部主任曾谷亲临指导。会议一开始，双方代表就针锋相对地争议起来。有地主代表说租额是由双方自愿确定下来的应是合情合理的；沙湾的地主代表甚至说，我们也不富裕呀，有时想吃云吞面都没钱。这时整个会场哄动起来，气得农民可恨又可笑。不少农民代表愤怒地控诉了地主如何勾结“大天二”欺压和剥削农民，不断提高租额，把一切苛捐杂税都压在农民头上，农民终年劳碌辛苦，做牛做马，得不到温饱，有的还被逼得走投无路，离乡别井，家散人亡的罪行。在农民的控诉下，地主代表理屈词穷，哑口无言。正在这时，我根据曾谷同志的意见并代表边区支前指挥所站起来讲话，明确强调现在国民党政府垮台了，“大天二”逃跑了，一切压在农民头上超经济剥削的苛捐杂税应当取消，退还给农民作为明春开耕的耕本，以利于生产。同时还宣布了征借军粮的具体办法和具体步骤，号召大家为了支援前线解放全国，我们一定要坚决地去完成上级交给我们全边区这次征借军粮的光荣任务。会场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而 10 多个地主代表则低着头悄悄地退出会场。

由于结合实际具体地贯彻了党和政府征借军粮的政策，办法对头，广大农民积极性很高，征粮队到各乡村开展借粮工作，得到农会具体指导和帮助，驻军的配合工作开展顺利，那时整个边区大小河涌的运粮船，日夜穿梭不息，掀起了交军粮运军粮的热潮。边区支前指挥所的码头忙得不可开交。由于运输力量不足，县支前指挥部派船来还是运不了，直到省支前司令部派来了好几批船队才解决了运粮问题。12 月底，第一期向地主征借军粮的任务已经完成，转入第二期向农民征借。到 1950 年的春节前统计全区已完成上级分配的 20 万担任务的

80%。还有 20%任务，大部分农民都陆续交了，只有小部分农民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思想问题（如受敌人谣言影响，怕变天思想等）或实际问题（如因向农民征借时间太晚，有些已把粮食用于婚嫁、盖新寮等），有拖交现象。为此，区农会于 2 月下旬召开全区各地农会会长和农民代表会议，分析了敌情，强调要及时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揭露敌人谣言，宣传大好形势，提高认识，解除思想顾虑。对于有实际困难的，经过查实，可给予适当减免。在边区农民中具有很高威信的区域农会会长陈九同志鼓励代表们说，我们解放了，但海南岛和全国有些地方还没有解放，那里的人民还在受苦受难。我们一定要完成支前粮食任务，支援解放军，解放全中国。会后，代表们信心十足，经过努力，到 4 月中旬，胜利地完成了全边区 20 万担征借军粮的任务，受到县委、县支前指挥部和省支前司令部的表扬。边区人民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作出了自己值得自豪的贡献。

（选自梁平：《回忆解放战争后期禺南南区的革命斗争》，中共广州市番禺区委党史研究室编：《番禺红色印记》，2014 年印行。）

中山党史